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五期／民國 94 年 9 月／頁 67～104

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

林繼文**

摘　要

本論文的主旨，在於探討理性選擇在台灣政治學研究中扮演的角色。論文首先回顧關於理性選擇的辯論，設定該途徑的狹、廣定義，並據此詳細檢閱被國科會列爲評比對象的十九種中文政治學期刊在過去數年所發表的一千五百餘篇論文。結果發現提及理性選擇的論文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實際運用的比例更低。本論文也發現，理性選擇理論固然可以用統計工具來印證，但仍有許多論文採取個案研究。反之，許多計量政治的研究和理性選擇是無關的。這種樣態，和美國的政治學有明顯的差距。原因之一，可能是台灣的政治學研究者必須先耗費功夫「了解」事實，才能企圖「解釋」事實，而此種狀況相當程度根植於美國政治和非美國政治的異質性。同理，本論文也論證理性選擇必須和其它途徑相互合作，才可能成爲具有解釋力的經驗理論。對理性選擇角色的評判屬於規範問題，但持不同立場的學者，都應對台灣政治學研究的現狀有具體的了解，才能設定合乎實際的改革議程。

關鍵詞：理性選擇、計量政治、政治科學、政治學方法論、改革運動

---

* 本文曾發表於「且讓河水通井水－政治學方法論的檢討和開拓」研討會，台北，2005 年 5 月 14 日。感謝國科會對本研究的補助（NSC93-2414-H-001-010），與王業立教授、徐振國教授、陳敦源教授、石之瑜教授、黃競涓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論文的指正與建議。本論文資料由沈有忠先生與莊文一先生協助蒐集與整理，一併致謝。

** 作者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收稿日期：94 年 5 月 23 日；通過日期：94 年 8 月 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改造運動」在改造什麼？

「革命已經發動，有人要加入嗎？」這是一個名爲「改造」（Perestroika）的運動在二〇〇〇年秋天所發出的號召。二〇〇一年九月一日，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在舊金山舉行最後一天的會議。上午十點十五分，會場內一間小小的會議室擠滿將近三百名政治學者及研究生，都是響應改造運動的籲求而來的。[1] 這個運動，要改什麼？造什麼？從其文宣看來，改造運動的對象是「重數學而輕實質的政治學」。對運動的參與者而言，另一個動機乃因數量化（mathematical）的政治學已經成爲霸權（hegemony），掌握著主要學校政治系的聘任和重要政治學期刊的編輯，宰制美國政治學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進而威脅其它次領域學者的生存權。對這群革命份子而言，「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和數量化的政治學是一體的，都在操弄數學符號而忽視實質內涵。所以，改造運動要打破理性選擇的霸權，解放其它次領域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地位，讓多元的方法論並存於此一學科。[2]

改造運動由發動迄今已超過四年，對於其成敗也有許多的討論。[3] 對身處台灣的政治學者而言，有人或許覺得這場改造運動所涉及的權力重分配事不關己，但也有學者呼應改造運動所揭示的課題。早在十多年前，蕭全政即曾認爲理性選擇（他稱之爲現代政治經濟學）「強調一般化、科學化、

---

1 這場「革命聚會」剛好發生在勞工節週末。關於改造運動的事件報導，請看 D.W. Miller (2001)。

2 某些改造運動的參與者已是知名學者。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 John J. Mearsheimer，他認爲改造運動必須聚焦於方法論，而且改革者都應該熟悉計量方法與理性模型，才能知道這些工具的限制。見 Miller，前揭文。

3 該運動有幾項具體的成果。第一，在改革呼聲中，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 Theda Skocpol 接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第二，美國政治學會另創一份期刊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第三，*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改變審查程序，不再以共識決決定是否接受論文。另一方面，也有學者開始重視理論模型與經驗檢證的互補性，推動“the empirical im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EITM)”的概念和活動。關於改造運動的主張，請參考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June 2002) 專題。對於這些主張，Dryzek (2002) 提出了解析和批評。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式化而脫離現實」（1988：25）。對於理性選擇是否壓抑其它的研究途徑，也有學者提出深刻的反省（徐振國，2002），並藉此探討台灣政治學方法論的現況。[4] 本文的立場是，不管學者如何看待改造運動，對改造運動所欲挑戰的學術霸權，都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因爲，這種霸權如果存在，其勢力範圍可能超越美國政治學界，而廣及其它地域。尤其是台灣，長久以來受到美國政治學的強烈影響；作爲邊陲地區，受到霸權支配的程度可能更勝於核心地區。

爲了呈現兩地政治學的關連，表 1 統計了二〇〇四年台灣各大公私立大學與研究機構政治學相關系所（單位名請參考附錄一）專任政治學者的學歷背景，並以級別與公私別作分類。從該表可以清楚得知，在台灣的政治學者中，將近有一半（45%）是美國所訓練出來的博士。[5] 以公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而言，如果只計算有博士學位的政治學者，更有 52.3% 是在美國取得最高學歷。[6] 若與右上欄的小計相比，可知美國取得博士有更高的機率任職公立機構。再以級別來看，於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有 54.1% 屬於教授或研究員，遠高於整體的同級比例 41.5%，顯示其相對較高之級別。在 191 位教授或研究員中，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的有 58.6%。由於升等教授需要時間，這個數字也說明美國政治學對台灣的影響不是近來才有的。

---

4 徐振國教授和閻嘯平教授並在 2005 年 5 月 14 日與 15 日舉辦了「且讓河水通井水—政治學方法論的檢討和開拓」研討會，以改造運動爲引子，探討台灣政治學界發展多元方法論的可能。

5 表 1 幾乎涵蓋任職台灣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政治學者的母體，但仍可能有部分遺漏，如任職於非政治學相關機構之政治學者。經濟學者對於理性選擇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但因本論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此一領域對政治學研究的影響，所以仍以政治學者爲主。

6 事實上，某些美國之外的國外大學也受到美國政治學強大的影響，如英國就是一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1　台灣政治學者取得最高學歷之國別（2004 年）：依任職機構別

任職機構	美國	非美、台	台灣	未取得博士者	小計
公立大學／研究機構	137 （66.2）	45 （62.5）	80 （57.6）	28 （66.7）	290 （63.0）
私立大學／研究機構	70 （33.8）	27 （37.5）	59 （42.4）	14 （33.3）	170 （37.0）
小計	207 （100）	72 （100）	139 （100）	42 （100）	460 （100）

說明：括弧內之數字爲欄對列之百分比

表 1-2　台灣政治學者取得最高學歷之國別（2004 年）：依任職級別

級別	美國	非美、台	台灣	未取得博士者	小計
教授／研究員	112 （54.1）	26 （36.1）	44 （31.7）	9 （21.4）	191 （41.5）
副教授／副研究員	50 （24.2）	23 （31.9）	58 （41.7）	13 （31.0）	144 （31.3）
助教授／助理研究員	45 （21.7）	23 （31.9）	32 （23.0）	6 （14.3）	106 （23.0）
講師／研究助理	0	0	5 （3.6）	14 （33.3）	19 （4.2）
小計	207 （100）	72 （100）	139 （100）	42 （100）	460 （100）

說明：括弧內之數字爲欄對列之百分比

在美國讀政治學，當然不表示就熟悉理性選擇途徑。不過，一個合理的假設是，留美學生有更大的機會置身（be exposed to）於受到該途徑影響的環境，如對相關學者的接觸、在課堂上對相關文獻的閱讀，甚至親身體驗訓練不同的學者在出版、升遷上的差異性。理性選擇已經有超過三十年的發展歷史，所以留美學生多多少少都會感到其影響力，甚至成爲其奉行者。當然，這種影響力不見得都是令人愉快的，熟知美國狀況的學者，或許更容易呼應改造運動的訴求。美、台政治學界緊密的學術聯繫，究竟是塑造出一批霸權母國的複製品，還是孕育出反霸權的抗爭者？在進行反省之前，我們必須對於台灣政治學的現況有清楚的了解。一方面，對於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造運動的台灣學者而言，了解「邊陲國」的實況，才能提出因地制宜的改革議程。另一方面，若有人希望台灣也走向美國政治學界的高專業化，更應該了解學界的實情。所謂現實狀況，就是指台灣的政治學研究，究竟有多大程度受到改革運動所謂的學術霸權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要先了解所謂的霸權究竟所指爲何。套用 Antonio Gramsci 的話來說，「霸權」是一種透過文化、知識或道德的宰制以獲得權力的過程，被宰制者甚至可能甘心樂意接受這種狀態，因此和純粹的強制力有所不同（Gramsci, 1975）。關於霸權的權力性格，我們需要更細緻的分析才能了解。但是對於其知識面向，卻可以經由學者的生產活動尋得蹤跡。

改革運動者所說的「數量化」政治學，範圍過於廣泛，可以包括只有百分比的論文，也可能指涉用到高深數學的賽局模型或統計分析。作爲一種霸權，這些論文當然不會只用數字或符號嚇唬外行。真正讓改革運動者感到不安的，是這些著作背後所隱含的科學觀。也正因爲如此，理性選擇才會變成改造運動的主要對手。[7] 對理性選擇的倡議者而言，該理論就算不是關於人類行爲唯一的科學典範，其形式化的（formal）特性也使其具有高度科學化的可能（Riker, 1990）。[8] 所以，改造運動的參與者直接將矛頭指向理性選擇，認爲這個研究取向就是霸權的意識型態基礎。不過，理性選擇究竟和量化研究有什麼關連？理性選擇在台灣有多大的影響力？台灣的政治學者是否也被理性選擇霸權所支配？或者，真正的霸主其實是「量化」？這篇論文希望能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某些解答。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要先了解理性選擇究竟是什麼。但這並非簡

---

[7] 理性選擇的影響力，可以用這個故事來形容。政治學中理性選擇學派的教父 William H. Riker 親創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政治系，Riker 和其門生在主要政治學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曾多到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編者致函 Riker，說該刊已快要變成“*William H. Riker Review*”。見美國國家科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對 Riker 的追思回憶（http://www.nap.edu/html/biomems/wriker.html）。事實上，Riker 是 1954～1994 年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名人榜的榜首，共有 16 篇論文發表在該刊，其被引用的次數也最多。名人榜的第三名則是 Riker 的學生 Peter C. Ordeshook。見 Miller, Tien, and Peebler (1996: 78)。

[8] 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是指透過假定（assumption），以邏輯推論出待證假說（hypothesis）。數學一定是形式化的，但形式分析不一定用得到一般所謂的數學。形式推論可以十分複雜，也可能只有簡單的邏輯形式。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單的問題。許多對理性選擇的批判，其實存在著定義上的誤解。所以，下一節將回顧關於理性選擇的爭論，並藉此澄清其定義與特質。第三節討論這樣的定義是否會讓某些「具有理性選擇意涵」的著作無法被歸類，並嘗試畫出一條分界線。根據定義，第四節報告台灣近年來主要政治學期刊研究論文之中理性選擇途徑所佔的份量，並和一些相關變數進行交叉分析，以追索其蹤跡所在。該節並以同樣的方法對比近三年來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 的論文，凸顯兩者的差異。第五節解讀研究發現，並說明理性選擇、計量政治（quantitative political study）和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關係。第六節結論，根據研究發現重新審視學術霸權的問題，並討論多元方法論的可能性。

貳、「理性選擇」是什麼？

改造運動者把理性選擇當作霸權，自然有其方法論上的依據。觀諸政治學重要的國際學術期刊，可以發現號稱採取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論文越來越多。受其影響的議題不但有選舉研究、國會研究，還廣及制度理論（Weingast, 1996: 167）、國際關係乃至於公共行政等政治學次領域。對改造運動者而言，理性選擇勢力的擴張，即爲對其它方法論的壓迫。但是，理性選擇究竟是什麼？表面上看來，此一途徑的定義十分清晰：社會行動者根據符合某些公設（axiom）條件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進行選擇，並產生社會本身的偏好排序（謝復生，2000：143）。所謂的理性（rationality），就是滿足完全性（completeness）遞移性（transitivity）的偏好順序。[9] 用白話說，理性就是指清楚而一致的好惡排序。根據這個定義，「理性」和「利己」是兩回事；一個利他主義者，也可以「理性地」根據他的理想進行利他的選擇。

理性選擇是從微觀（即個體）的理性出發，解釋宏觀（即社會）的集

9 我們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表達這兩種性質。令 R 表達偏好關係（preference relations）。所謂完全性，是指對所有的任意兩選項而言，xRy 或 yRx。遞移性則指對任意的 x, y, z 而言，若 xRy 且 yRz，則 xRz。偏好順序若不能滿足完全性，行動者就可能無法對某些選項作選擇；如果違反了遞移性，行動者就無法找出其最佳選項。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選擇，所以屬於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又因爲透過公設系統來進行推論，所以一定具有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的特性，而這也是理性選擇常常運用數理模型的原因。對 William Riker 等學者而言，這種形式化的特性讓理性選擇較其它的途徑更有科學化的可能：由於真前提不能推出假結論，理論若被事實否證，必定是前提不正確，而邏輯形式可以讓我們知道出問題的前提在哪裡。只要不斷修正前提，理論對事實的解釋力就會越來越強。

雖然理性選擇的定義十分明確，卻時常引起誤解甚至誤用。有些對理性選擇的批評是針對其解釋力，有些卻把某些特定的理性模型當作普遍性的理性選擇途徑。爲確知理性選擇爲何物，我們得先回顧關於此途徑的辯論，才能賦予其更明確的定義，進而檢視台灣政治學的生產活動。歸納起來，對理性選擇的批判可略分爲以下幾類。其中第一、二類涉及理性公設的問題，三、四類和解釋的邏輯（the logic of explanation）有關，最後一項則質疑該理論的解釋力。[10]

第一項批評涉及理性選擇的公設，又可分爲兩類意見。首先，有學者認爲可以修改一致性和完全性的公設，使理性選擇更周延，不至於陷入「理性的弔詭」（the paradox of rationality），亦即根據理性假定得出不理性的推論（Schwartz, 1986；Anand, 1993）。其次，許多學者認爲理性選擇的公設不符現實。最有名的批評，就是否定人類偏好的一致性，且透過實驗證明偏好可能隨著利益的大小有所變化（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第二種批評，主張就算理性偏好存在，也不見得爲行動者所認知。此點批評和前項相關。理性選擇理論既然具有實證性，其公設就應符合現實。然而，單就「理性人」的根本前提來看，理性選擇的設定可能就太強。其中最常被質疑的，就是行動者往往不像研究者那樣能清楚地描繪自己的理性計算或認知過程。因此，理性選擇的前提似乎不如某些理論來的實際。例如，有限理性理論（theory of bounded rationality）（Simon, 1955）對人的

[10] 在批評理性選擇的政治學論著中，最著名也最常被引用的應是 Green and Shapiro (1994)。許多本文引述對理性選擇的批判來自此書。不過，本文之所以要處理有關理性選擇的辯論，目的在於釐清此一領域的本質，以便替台灣政治學的學術論文歸類，並不代表筆者完全同意任何一方的意見。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性就採取了較爲符合現實的界定；演化理論則以爲行動者所具備的只是某些通過時間考驗、能夠抵禦突變的行爲法則（Veblen, 2003: 7-21）。也有政治學者認爲，心理學比理性選擇理論更符合實證研究的精神（Elster, 1993）。

第三，有人批評理性選擇只能進行後設的特定解釋（ad hoc explanation）。理性選擇根據公設推演出邏輯延伸（logical extension）、設定待證假說，並依此進行實證研究。然而，這樣的「理論」其實只是「套套邏輯」（tautology），永遠可以根據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回過頭來修正其假設，使人無從判斷理論的真僞。對批評者而言，這使理論永遠自圓其說，無法確知在何種情形下失效，所以不合乎科學理論的條件（Opp, 1999: 179-184）。

第四項批評，認爲理性選擇可以隨意設定解釋範圍（domain of explanation），將某些不符其前提的議題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例如偏好不明確的、未經計算或成本很低的行爲（Green and Shapiro, 1994: 27-28）。這使研究者可以任意設定其理論的適用範圍，將不能解釋的現象視爲非理性的，而不必接受異例的挑戰。這當然也不符合科學精神。

第五，許多人認爲理性選擇的推論往往不符實際，而這也是該理論最容易引起批評的地方。批評者往往是舉出某些現實的案例，質疑特定理性選擇理論或模型的有效性。例如，對於選民爲何違反理性選擇的預期而去投票，就有相當豐富的討論（如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Green 和 Shapiro (1994) 即曾根據人群互助的許多實例，質疑集體行動的邏輯（Olson, 1965）一書。也有學者針對著名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提出修正，並依此檢討整套理性選擇模式（石之瑜，2003）。其他各領域的學者，也經常有類似的批評。

這些批評引起諸多討論乃至共鳴，而改造運動可以說是由理論走向實踐的手段之一。對於上述批判，已經有許多的回應（例如 Riker, 1990；Cox, 1999；Johnson, 1996；Friedman ed., 1996；盛治仁，2003），可以歸納如下：

首先是關於公設的真僞問題。某些理性選擇論者認爲，過於複雜的假定將使錯誤的理論難以被修正，所以理論的假定應該越簡單越好。理性選擇的公設雖然不見得完全合乎現實，但已趨近行動者在進行重大選擇時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思維過程，再加上理論假定的簡潔性，因此比其它理論更具有進步的可能性（Riker, 1990；Tsebelis, 1990: 1-17）。對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而言，重點不僅是理論假定的真僞，而是這些假定能產生多大的預測力。[11] 更何況，所有科學理論（包括物理學）的前提都有可能是經驗無法感知的；反之，許多經驗感受可能是錯覺（如地球中心說）。因此，採用理性假定只是爲了建構理論所暫定的，真正的重點還是理論的準確度。

其次，關於行爲者對理性偏好的認知問題，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1953) 曾言，優秀的運動選手往往不知道其動作乃遵循特定物理法則的結果。同理可推，理性人的行動可能是習慣或學習而來的，因此不見得需要經過認知或有意識地計算。演化理論甚至認爲，生物的行爲法則是歷經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長時間演化而來的，行爲者如果要了解每個動作的計算反而浪費訊息成本，是不理性的。最極端的講法，是把基因看成行動主體；生物只不過是基因的「載具」（carrier）而已（Dawkins, 1990）。再者，理性選擇也不假設行動者具有充分的資訊，相關模型常用機率形式來描繪利益計算，就是要表達行動者面臨的不確定性。

第三類的回應是有關特定解釋的問題。理性選擇最大的優點，就是假設與推論之間的邏輯關連。如果理論的目的就是要讓現實有機會否證假設，特定解釋就一定是理性選擇的特性。那麼，我們判斷該理論真僞的準據又是什麼呢？James Johnson (1996) 認爲，許多對理性選擇的批判，其實和其形式邏輯無關，而是針對偏好的假定而來的。這個部分當然涉及真僞，也應該從實證的角度加以評判。因此，理性選擇的理論本身就包含了形式邏輯、偏好描述與制度條件等部分，批評者必須了解其批判的對象爲何，而不能概以特定解釋貫之。

第四，針對解釋範圍的問題，論者以爲理性選擇理論所關切的是個體偏好的一致性、合理性與行動的效率性，因此當然有範圍的限制。因此，理性選擇不應自稱具有解釋所有人類行爲的能力，而應謹慎選擇解釋對象。

[11] 關於理性選擇在科學方法上的立場，MacDonald (2003) 曾從實在論（real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的角度加以比較，並認爲兩者難以共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推論是否符合實際，是關乎理性選擇是否能成立的關鍵因素。雖然學者可以針對特定理性選擇理論的預測力提出質疑，但問題可能出自該理論的設定，而非整個理性選擇本身的缺陷（詳第三點）。以 Green 和 Shapiro (1994) 所舉出的案例而言，只要修改部分的模型假定或參數，就可以符合實況。例如，對於「囚徒困境」，就可以透過賽局的無限延長（Axelrod, 1984）或制度設計（Calvert, 1995: 191-215）而得到解決。更重要的是，理性選擇一定得具有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才可能滿足實證科學的要求。

透過以上的辯詰，我們已經可以爲理性選擇應有的樣貌勾勒出大致的輪廓。對理性選擇最大的誤解，就是把它當成當成經驗理論（empirical theory）。理性選擇當然是以建構科學理論爲目標，但卻只是達成此一目標的必要手段，而非充分條件。質言之，理性選擇所設定的只是某種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的大前提（major premise）。要進行預測或解釋特定現象，還得確知這個機制的起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講得更白話一點，理性選擇要能成爲經驗理論，得和廣義的經驗研究（包含歷史學）結合：前者提出一套「若 X 則 Y」的規律，後者告訴我們 X 是什麼。許多批評理性選擇的人忽略了這一點，但有更多理性選擇的研究者也不清楚這一點（例如，隨性假設所有政治人物都想極大化其權力，而忽略某些人可能是理念型的領袖）。如果只有理性和行爲的大前提，理性選擇無法解釋任何事情，所以根本無從成爲經驗理論。[12]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以界定理性選擇成立的條件：

條件一：針對個體的理性偏好，所有的理性選擇模型都必須採取「完全性」和「遞移性」的假定。換言之，這是公設。

條件二：個體偏好和個體行爲之間，必須存在邏輯關連，而所有理性選擇模型都必須如此設定。這是理性選擇理論最特出之處。偏好或許不容易觀察，但只要偏好和行爲之間存在邏輯關連，即可透過對行爲的觀察來修正對偏好的假定。

[12]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 Green 和 Shapiro (1994) 批評理性選擇不能解釋人爲何要去投票。Green 和 Shapiro 和他們所批評的對象都假定人在投票時會計算所有其他人去投票的機率。但這只是某一種偏好的計算而已。如果投票的意義像消費行爲，計算過程就會很不一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條件三：個體行爲須能透過某種機制（mechanism）轉化爲集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所謂機制，可能是制度，也可能是某種競賽規則，但是必須要清楚標示，解釋才能完整。

條件四：理性選擇理論必須對個別行爲者的偏好進行假定才能進行預測。理性選擇從未假設行爲者的偏好是同質的（如利己不利他）。因此，偏好乃因人而異，對偏好的描述也是個別性的。

根據以上的條件，亦可澄清理性選擇和計量政治的關係。[13] 理性選擇的模型如果符合條件四，即可推得待證假說，成爲經驗理論。但假說檢證（hypothesis testing）是否必定是計量的，卻和檢證的邏輯有關。我們可以想像三種可能。第一，假說檢證可能需要在大量資料中探索變數間的相關性，因而使用較複雜的統計工具。第二，符合假說的個案數目可能很少，運用推論統計反而會誤導讀者。所以，研究者可考慮使用敘述統計，並說明推論的限制性。[14] 第三，假說的目的可能是要否證某些理論，因此只要證明理論和少數個案不符即可。整體而言，理性選擇論者會希望其理論能夠得到充分證明，所以第一類最爲理想，但這絕非證成理論的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必須強調的是，不管檢證的方式爲何，理性選擇都必須提供一套因果機制。如果欠缺此種機制，即使運用複雜的統計工具，也不能滿足科學的條件。因爲，統計相關（statistical correlation）絕不等於因果解釋。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性選擇甚至可以只針對單一個案進行分析，或採用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方法。只要理論能完整呈現個體選擇和集體後果間的因果機制，就可以被接受。事實上，許多採用理性選擇途徑的傑作，正是個案分析。[15] 所以，我們預期相當多的理性選擇採取計量

---

[13] 所謂計量，預設分析單位之間具有可共量性，所以可以總估其量。至於統計工具的選用，則和觀察對象的特性、個案的數目以及假設的性質有關；統計工具能呈現的訊息和其複雜性沒有必然的關係。

[14] 即使個案數目少，對資料的檢證仍須採用和個案數目多時同樣的邏輯。不過，個案數目少，有時需要使用不同的機率分佈假設才能進行推論。個案數越少，變數越多，推論就越困難。

[15] 例如，Ostrom (1990) 關於共享自然資源的研究就是由個案研究累積而成的。如果不透過詳細的個案描述，讀者就無法知道相關制度演化的具體過程。而此書是以理性選擇研究類似問題的代表作之一。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析，但兩者並非絕對相關。

參、「理性選擇」不是什麼？

如果前述四個條件是理性選擇的必要條件，違反其中任何一項是否就不能算作理性選擇？理論上，答案是肯定的。至少，理性選擇需要具備這些條件才能實現其成爲經驗理論的目的。然而，除非我們要求理論的概念像數學般精確，要宣稱某些情況違反某些理性選擇的條件並非易事。主因在於大多數政治學的論文採用文字敘述來呈顯分析概念，而這些概念是否符合理性選擇的條件，可能是模稜兩可的。舉例而言，「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是大家都朗朗上口的定義，但是什麼是「價值」？什麼是「權威」？很難一語道盡，更別說測量。當某位作者說「總統希望能夠不受控制地任命總理」，算不算是偏好的描述？有些研究者希望用數學來陳述概念，但這些抽象的符號反映了多少現實，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形式和實質的差距，是所有社會科學都無法避免的難題。

那麼，理性選擇和非理性選擇的分別究竟在哪裡？如果一篇論文採用形式化的分析，問題就很單純：我們只要檢視其假定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即可；至於形式表達了多少實質，不是本文關切所在。對於非形式化的論著而言，我們就必須畫出一條界線。決定某篇論文在線內還是線外，必須回答下列問題：

第一、分析是否採取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若然，該論文至少需要區分兩個分析層次，亦即個體的和總體的。[16]

第二、如果前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論文是否假設個體是依其利益或效用而行動？

第三、如果前兩項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論文是否企圖從個體行動推論總體結果？

如果某論文未採取形式分析，但以上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即

[16] 所謂個體不一定指個人。舉例而言，如果我們用兩岸政府的策略來解釋兩岸關係，政府就是個體，而兩岸關係則是由這些個體所構成的總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被歸類爲「廣義的理性選擇」。如果某論文採取形式分析，且符合前節所述的四個條件，即表示理論具有嚴密的邏輯形式，故可稱爲「狹義的理性選擇」。如果不符合上述三條件，就不能算理性選擇。更具體言之，下列情況應被排除在理性選擇範疇之外：

第一、論文並未採取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如歷史結構論、系統論、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等。譬如說，以「資本主義的邏輯」來預測資本主義體系的變化、用政治體系的反饋（feedback）來解釋系統的穩定、用國際體系的極化（polarization）來預測國家的行爲等。此一類別也包括未從構成份子的角度來解釋總體變化的區域研究、從組織文化來解釋官僚行爲的公共行政理論等。

第二、認爲行爲的動力不在利益或效用的考量，而在其它未經計算的因素，如情緒、心理狀態（如情結、意識型態等）。舉例而言，如果研究者認爲政治社會化是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且不會在短期內改變，就不屬於理性選擇；但若國家認同是基於對安全或經濟的計算而選擇出來的結果，就可以用理性選擇來研究。

第三、未將個體行爲連結到集體選擇。典型的例子是只研究單一的政治領袖，但不探討其行爲和他人的關係，也不處理行爲的後果。某些敘述性的區域研究即在此列。有些研究看起來有討論到兩個層次，但完全採用歷史陳述而不處理連結的因果機制，也在排除之列。[17]

除此之外，以下的途徑明顯也不屬於理性選擇：政治思想、規範性政策研究、法理分析、政策建議、統計方法論等。不過，某些規範性研究可能具有實證的案例或意涵，可以視情況決定其歸類。[18] 還有一種特殊的狀

[17] 最常見的案例，就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外交政策。此類研究被排除在理性選擇之外的情況可能有：⑴只分析一個國家，⑵雖有討論到多國，但不處理互動，只分述各國的對外政策。如果能分析各國的對外政策如何互動，進而影響國際關係的變化，就可歸爲理性選擇。

[18] 舉例而言，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了「所有人與所有人爭戰」的原始狀態來說明主權的產生。有人以「囚徒困境」賽局描繪這種狀態，就可以視爲理性選擇的範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況，就是論文比較各種方法論，而其中理性選擇被當成討論的對象之一。因論文不屬實證性質，在歸類時應特別註明爲「方法論上提及理性選擇」。

根據以上的觀點，不少政治學的分析架構其實符合廣義理性選擇的形貌，但有時需要讀者對文本進行（理性選擇）意涵的詮釋（interpretation by implication）。如果作者的意圖不清楚，詮釋就會有灰色地帶。此時，只能由詮釋者進行個別判斷。這種判斷必然有所誤差，但只要標準清楚，對結果應不致有太大的影響。根據筆者對期刊的檢閱，以下是一些經常出現在政治學相關期刊，也符合廣義理性選擇的實例：

- 在選舉研究中，許多研究預設了選民或政黨的理性選擇，如策略性投票、經濟投票、分裂投票、提名策略、配票策略等。所謂總體後果，通常是選舉結果或政黨表現。
- 在比較政治的領域，制度選擇、憲政設計、政府組成、分立政府、國會研究都是可以運用理性選擇的課題。其行動者多爲政黨、議員、政府或政治領袖，其偏好通常涉及個人利益或政黨權力的擴大，依變項則以制度運作的後果爲最多。
- 以國際關係而言，現實主義、戰略三角、決策理論、阻嚇戰略都可能用到理性選擇。行動者至少兩方，多則涉及數國甚至國內之競爭者。其因果機制通常涉及決策者或國家的權力極大化如何帶動國際體系的變化，或影響武力衝突的機率等。
- 公共行政也有可能受到理性選擇的影響，如國會對政府的授權（power delegation）、官僚控制、預算或公共資源分配、訊息流通或共享資源等。在公共行政的領域，總體現象可能是政策內容、政策後果、組織表現、政府行爲，或資源分配模式等。

這些課題不僅涉及某些根本性的政治學理論，也常出現在台灣政治中。但在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數量究竟有多少？是否都符合理性選擇的條件？這是下一節要回答的問題。

肆、不可承受之輕：理性選擇在台灣

我們可以根據前述定義，對台灣的政治學研究的出版品進行內容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析，探索理性選擇在其中的份量。本論文檢證的論著，是以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列入「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的 19 份中文刊物（吳玉山等，2003）爲基礎，往前後時間延伸，共計 1,574 篇研究論文（相關訊息請參考附錄二）。[19] 這些期刊都採取了匿名審查制，且具備一定學術格式，因此可作爲台灣政治學期刊的代表，其論文也具備一定專業水準。[20] 本研究將以每篇論文爲單位，檢視內容是否符合前節所敘述的條件，並將其歸類爲狹義理性選擇、廣義理性選擇、方法論上提及理性選擇或非理性選擇等類別。爲了讓讀者明瞭具體的資料登錄過程，附錄三說明本論文所採取的篩選步驟，並以三篇論文爲案例說明其歸類的流程。[21]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回答一開始問的問題：深受美國影響的台灣政治學界，是否在學術生產上也以美國爲範例？兩者的異同，反映出什麼趨勢？理性選擇到底是不是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霸權？這些問題的答案不但可以呈現理性選擇在台灣政治學中的角色，更可透露這個號稱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研究取向是否只適用於特定的課題。更具體言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包括：

第一、理性選擇在所有研究論文中所佔比例爲何？其出現機率和期刊性質有無關連？

第二、論文採取理性選擇途徑與否，和次領域有無關連？和研究對象有無關連？

第三、理性選擇和計量研究的關係爲何？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表 2 看出。即使採用寬鬆的定義，真正運用理性選擇的論文也不到十分之一，而廣義的理性選擇論文遠多過狹義的。[22]

---

19 其中包含英文期刊 *Issues & Studies*，然其對象和中文期刊不同，故不列入本研究。書評或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因性質特殊，也不在考量之列。

20 政治學期刊當然不只這 19 份。然而，一個合理的猜測是，理性選擇出現在這些期刊中的比例高於其它期刊，所以理性選擇的比重只可能被高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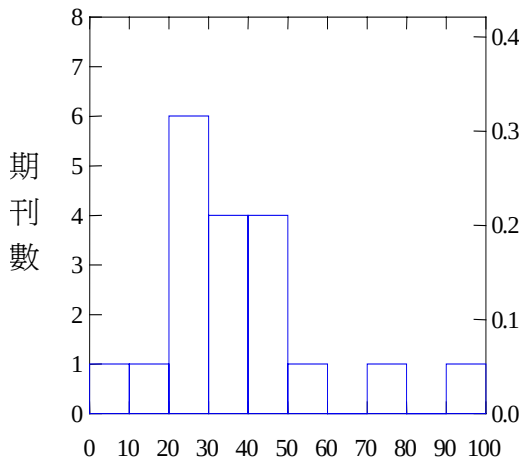
21 在相關的文獻中，Dow and Munger (1990) 曾經針對美國政治學中公共選擇的份量進行過統計。此一領域對偏好採取較狹隘的定義（如選票極大化、預算極大化等自利偏好）（見 Friedman ed., 1996: 2），所以比理性選擇更容易辨認。這或許是兩位作者沒有提出清楚的操作定義的原因。

22 如果從時間上來看，理性選擇的份量並沒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現象。比例最高的是 2000 年（12.8%），最低的是 1999 年（6.1%），而高低之間沒有時間的順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論文是否集中在特定期刊？若把狹義和廣義的理性選擇論文在其發表之期刊中所佔比例算出，其柱狀圖如圖 1。圖形和常態分佈有些差距，顯示這類論文的確集中在特定的期刊上。表 3 將這些比例從高排到低，並列出超過 10%（即平均值）的期刊。從表 3 可以看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除了出版時間較短而論文數目較少的《國家發展研究》之外，其它幾份期刊幾乎都曾被國科會列爲「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的正式名單或觀察名單。[23]然而，也有曾列入 TSSCI 名單但不在表 3 的期刊，包括台大政治系出版的《政治科學論叢》、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問題與研究》和《中國大陸研究》，以及最新被列入觀察名單的《遠景季刊》等。這兩類期刊有何差別？理性選擇是否比較符合某類期刊的標準？我們還需對論文的次領域作更深入的分析。

圖 1　理性選擇論文在 19 份期刊中所佔百分比的柱狀圖



[23] 關於 TSSCI 的標準與收錄期刊，請看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網站（http://ssrc.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理性選擇論文在台灣 19 份政治學期刊中所佔之比例

	狹義理性選擇	廣義理性選擇	方法論討論	總計
論文數目	40	96	22	158
佔所有論文之百分比	2.5	6.1	1.4	10.0

表 3　理性選擇比例超過 10% 的期刊

期刊名稱	時間（西元）	本數	篇數	理性選擇篇數	%
選舉研究	98～04	14	80	30	37.5
台灣政治學刊	98～04	8	33	10	30.3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98～04	29	32	7	21.9
歐美研究	98～04	28	22	4	18.2
東吳政治學報	98～04	11	57	10	17.5
國家發展研究	01～03	5	16	2	12.5
理論與政策	98～04	24	113	12	10.6

說明：⑴理性選擇不包括只在研究方法上提及者；⑵綜合類期刊只計算政治學類研究論文。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要探詢的答案。表 4 進行了「理性選擇與否」和「期刊次領域」的交叉分析。次領域包括以下幾類：比較政治、國際關係、方法論、公共行政及政治思想。因爲台灣的特殊性，表中也統計了台灣研究和中國大陸研究的篇數。又因爲某些論文可能橫跨數個次領域，所以次領域的篇數總和超過論文總數。根據表 4，不同次領域果然有明顯落差。以狹義的理性選擇而言，出現在比較政治的機率遠高於其它次領域。廣義的情況更明顯。方法論類的比例雖高，原因在於理性選擇多被當作方法之一提及，和比較政治的情形不同。這樣的情形，是不是因爲比較政治（含台灣研究）的某些特質，使理性選擇較易發揮功能？尤其因爲理性選擇設定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比較政治的課題是否較易滿足這個條件？在進行詳細的討論之前，我們可以先看看理性選擇和計量方法的關係。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表 4　理性選擇與次領域的交叉分析

次 領 域	論文總數	狹義理性選擇	廣義理性選擇	方法論討論
比較政治	584	30（5.1）	96（16.4）	10（ 1.7）
國際關係	313	9（2.9）	9（ 2.9）	0（ 0.0）
方 法 論	62	2（3.2）	5（ 8.1）	19（30.6）
公共行政	467	8（1.7）	15（ 3.2）	12（ 2.6）
政治思想	81	0（0.0）	2（ 2.5）	0（ 0.0）
台灣研究	575	35（6.1）	69（12.0）	4（ 0.7）
中國大陸	245	1（0.4）	18（ 7.3）	3（ 1.2）

說明：⑴括弧內之數字爲該欄在該次領域中之百分比；⑵某些論文可能屬於一個以上之次領域。

第三個問題的用意，在於顯示理性選擇的實證意涵。理性選擇常被當成是「實證政治理論」（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主要的分析工具（Austen-Smith and Banks, 1999）。即便不是如此，理性選擇既然號稱最接近「嚴謹的科學」（rigorous science），就應該進行假說檢證。因此，我們預期應用性的理性選擇比其它途徑使用計量工具的機率高。當然，理性選擇也可用個案研究驗證其理論，別的途徑也可以用到計量工具。如果我們對計量工具採取最寬鬆的定義，亦即只要用到百分比以上就算，結果就如表 5。正如預期，理性選擇有超過一半的論文使用到計量工具，而這個比遠高於非理性選擇的論文。我們還可對兩者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如果我們把某期刊出現理性選擇論文的比例當作自變數，用以解釋期刊出現計量論文的比例，則其關係如圖 2 所示。兩個變數呈現非常清楚的線性相關。如果我們用線性迴歸描繪兩者的關係，可以得到一條饒富意義的函數：計量％＝21.3＋1.6 理性選擇％。[24] 這表示，如果完全沒有理性選擇的論文，平均而言一份期刊出現計量論文的比率大約是五分之一，但每多 1% 的理性

[24] 因爲我們的資料涵蓋了台灣政治學主要的期刊，已接近母體，所以敘述統計就可以呈現其意涵。這個迴歸的 R^2 是 0.81，「理性選擇％」的標準差是 0.28，t 值是 5.64。這個相關只是在描述兩者的關係。由於理性選擇在各期刊並非常態分佈，所以對於統計結果必須進行謹慎的詮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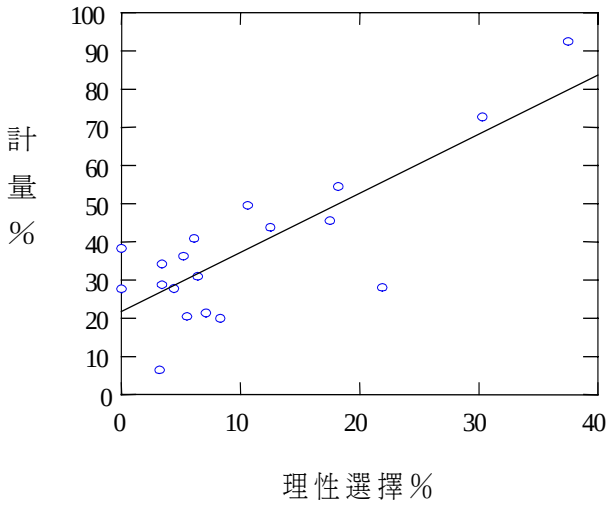
選擇論文，該期刊使用計量工具的論文就會成長 1.6%。換言之，如果一份期刊所有的論文都用到某種統計，理性選擇應該剛好佔了一半。

表 5　理性選擇與計量方法的交叉分析

	理性選擇	非理性選擇	總計
計量	81（51.3）	487（34.4）	568（36.1）
非計量	77（48.7）	929（65.6）	1006（63.9）
總數	158	1416	1574

說明：⑴理性選擇包括狹義、廣義與方法三類，⑵括弧內之數字爲欄對列之百分比

圖 2　理性選擇和計量研究的相關性



伍、台灣的政治學研究在研究什麼？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這樣描繪過去幾年台灣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即使用最寬的標準來看，理性選擇和計量分析所佔比重都十分有限。這類「數量化」的論文有相當高的比例出現在特定期刊之上，其中又以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較政治（大多是台灣研究）爲最多。實證性的理性選擇的確比它類論文更可能用到統計工具，但採用個案分析的論文也不少。回歸本論文一開始所陳述的課題，我們要問：這樣的情形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我們要如何描述台灣政治學的「當前發展狀態」（state of the art）？如果台灣的政治學需要革新，要從哪裡開始？理性選擇真的是霸權嗎？更重要的問題是，那些既非理性選擇也非計量的政治學論文，究竟是用什麼樣的途徑在研究什麼課題？

我們還是從孕育理性選擇的土壤開始談起。政治學最特出之處，就是始終受到其它學科的影響。理性選擇是政治學和經濟學共通的語言，但在四十年前的政治學界卻幾乎不見蹤影。它在美國的發源地，不是東西岸的菁英名校，而是原本默默無聞的羅徹斯特大學政治系。它的第一代旗手，不是赫赫有名的高堂學者，而是一群默默無聞的技術工匠。這個研究途徑，爲什麼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對美國政治學界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以下是筆者個人的猜測。第一個原因，可能在於該途徑宣稱可以讓政治學「真正科學化」。不論其真僞，這種企圖讓別的學門對政治學有了不同的看法。[25] 大規模的研究經費，通常是由多學科的學者組成的機構來審核分配，而政治學的新樣貌，讓它和自然科學以及經濟學站到同一邊。由於美國學術界存在高度的市場競爭壓力，這種結構也影響到學術期刊的走向，讓「具有科學樣貌」的理性選擇很快脫穎而出。出版和資源分配互相增強，連帶影響政治系的人才聘用。

在美國政治學的研究計畫中，採取嚴格理性選擇途徑的計畫可能仍是少數。號稱能開設相關課程或撰寫相關論文的學者，想必也十分有限。然而，理性選擇的相對影響力仍不可忽視。這點，可以從頂尖期刊中類似論文出現的比率看出。爲了瞭解其影響力，筆者針對 2002 至 2004 年發表於 *APSR* 的 113 篇期刊論文，依據同樣的方法將其分類，並檢視其是否運用到理性選擇。選擇這份期刊的原因有：⑴ *APSR* 被公認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學期刊之一；⑵這是被「改造運動」列爲霸權機關報的刊物，但

[25] 理性選擇並非首度宣稱可以讓政治學科學化的途徑。但其形式理論的特色，能讓理論與證據產生更大的關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2 年距離運動已有一段時間，該刊修正後的編輯方針理應對運動訴求有所回應；⑶該刊乃以「多樣」（diverse）的讀者爲對象，所以投稿者必須證明其分析具有一般性（general）的理論貢獻。簡言之，這份期刊大約透露出政治學在美國的發展現況，或至少顯示其學術議程的走向。表 6 記錄了統計的結果。

表 6　理性選擇與計量分析在 *APSR*（2002-4）年的比重

次領域	論文總數	計量分析	理性選擇（廣、狹義）
比較政治	32	30（93.8）	16（50.0）
國際關係	15	13（86.7）	7（46.7）
方法論	26	21（80.8）	18（69.2）
政治思想	20	0（ 0.0）	2（10.0）
美國政治	37	33（89.2）	20（54.1）
總計	113	81（60.9）	53（46.9）

說明：⑴括弧內之數字爲該欄在該次領域中之百分比；⑵某些論文可能屬於一個以上之次領域；⑶實驗或模擬歸入計量方法；⑷該刊涉及公共政策或行政者全爲實證性質，故依研究對象列入比較政治或美國政治。

APSR 在次領域上的分佈還算多元，但除了政治思想外，幾乎都顯露出實證主義的傾向。和台灣相比，上述資料顯示一些重要的訊息，可用來判斷兩地的異同。首先，兩者理性選擇出現的比例相差懸殊。表 6 共有 53 篇論文和理性選擇有關（佔總數的 46.9%），即使以台灣出現此途徑比例最高的期刊（台灣政治學刊、選舉研究）來對比，仍有相當的差距。其次，除了政治思想，理性選擇出現於其它次領域的比例都相當高，而此一途徑的論文幾乎都運用到計量工具。這點是和台灣類似的。第三，就次領域的分佈而言，理性選擇在方法論出現的比例最高。這是因爲許多相關的方法論研究與形式理論、賽局理論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選擇比例次高的正是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則緊追在後。[26] 詳細檢閱在這兩個次領域發表的

[26] 有關方法論的研究，台灣的期刊多以文獻回顧爲主，*APSR* 卻有很多論文是建構研究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文，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特色，或許是台、美差距的另一種解釋。

在美國政治方面，運用到理性選擇的論文有相當多都在處理投票行爲與政治制度的運作與後果，而這並非偶然。如果我們仔細探究理性選擇崛起的過程，就會發現它和美國政治的關係十分密切。中位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等著名的理性選擇理論（Grofman, 2004），看似高度數學化，其實都有美國政治的影子，例如兩黨競爭、立法政治、國會制度等。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投票行爲能成爲理性選擇的議題，有幾個主要的原因：⑴其憲政體系、政治制度和政黨體系沒有太大的變動；⑵其選舉基本上已定型化，競爭者和選民的行爲具有高度穩定性；⑶美國的民主政治發展相對成熟。這些因素使美國政治的研究者不必擔心短期因素的干擾，而得以把制度當作影響個體行爲的遊戲規則，透過長期而廣泛的資料來驗證理論假說。因爲行爲的可預期性高，研究者並不難透過反覆驗證找到其理性基礎。[27]

在 *APSR* 中，理性選擇在比較政治出現的比例也很高，但理由和美國政治有一些不同。所謂比較政治，是指論文的研究對象屬於美國以外的地區，但議題和國際關係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發現，刊登在 *APSR* 上的比較政治論文，通常會運用到龐大的跨國資料庫，並對其進行統計檢證。但這也使其議題範圍有所限制。我們發現，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國家經常出現在跨國比較中，而變數則以總體經濟與可量化的制度變數最多。也有論文探討許多國家並存且文化差異不大的區域，如歐洲聯盟的制度運作、拉丁美洲國家的選舉、非洲的族群戰爭等。國際關係理論亦然：許多論文都涉及數據龐大的戰爭資料庫，但對於特定國家間的關係，則少有關注。至於針對單一國家，以研究美國政治的方式進行理論化、計量化的研究，在 *APSR* 上極少出現。

依此而論，「區域研究」（area study）是較難出現在 *APSR* 上的。區

法或分析模型，所以理性選擇出現的比例自然很高。

[27] 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固然可以解釋制度後果和制度選擇，但是理性選擇在前者的成果較豐碩。例如，憲政體制的研究通常假設內閣制、總統制或半總統制是固定的制度條件，然後再探究其後果，對選舉制度的研究亦然。

臺灣人權學術期刊資料庫

域研究通常是針對特定國家的某些議題進行詳細的描述，或是對少數國家進行個案性的比較。由於分析單位的數量少，較難進行一般化、理論化。但是，這恐怕正是大多數比較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工作。[28] 爲什麼？首先，美國政治的制度背景變遷不大，卻有非常多的定期選舉或關於政府運作的詳細資料，使得學者可以把制度條件當成常數，透過長期性的資料檢證其理論上的命題。但這樣的情形鮮少存在於其它國家或地區。對研究這些地區的學者而言，其首要工作是要了解其研究對象的特異性（idiosyncrasy），而不是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共同性。例如，在分析新興民主國家政治制度的影響時，研究者必須先了解這些制度的意涵與正當性。某些國家雖然形式上具備和歐美民主國家類似的憲政制度，但人民的認知差異可能很大，而制度的形式規則往往不能充分規範其實際運作。再者，這些地區的制度可能變動性很大，受到如社會動亂、革命、體制崩潰、菁英操縱等因素的影響。對研究者而言，這種變動才是研究的重點。基於同樣的原因，要針對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跨國比較甚至建構跨國資料庫，首要的難題就是同樣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是否可以共量（commensurate）。舉例來說，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採取內閣制，但是其實際運作狀況常有相當的差距，很難當作變數上的同一個類別。

當然，這個問題可以隨著測量技術的精進而有所改善。或許，學者要去描繪的不只是中央政府體制，而是其實際運作的狀況。但這也表示研究者必須對其研究對象有清楚的認識，而不能輕易地把一個國家當成許多數據中的一點。同理，理性選擇也可以處理類似的課題，但必須先了解菁英和民眾實際的政治態度，才能適切地描繪其偏好。這也就是爲什麼區域專家需要先了解其研究對象的政治文化和風土民情，然後才能將其理論化。這樣的關懷，和理性選擇論者所欲建構的普遍法則沒有本質上的矛盾；如果有足夠條件的配合，理性選擇也可以在美歐以外的地區得到發展。[29] 但

[28] 許多國際期刊其實屬於區域研究的性質，甚至不太接受高度計量化的論文。某些比較政治的期刊則較重視理論化，如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等。

[29] 許多對理性選擇的批評，認爲理性選擇強調的自利、工具理性本身就是一種特定的文化，不能用來解釋西方以外的地區。Daniel Little (1991) 反對這種說法，認爲目的性（goal-directed）的行爲並非西方所獨有。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在設定學術議程（academic agenda）時，的確可能會有不同的優先考量。[30]

從這個觀點來看，理性選擇並未成爲台灣政治學研究的主流，就不足令人爲奇了。首先，如果我們檢視理性選擇出現比例最高的期刊，如《選舉研究》、《台灣政治學刊》等，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論文是在探討台灣的選舉。長期施行各種層級的選舉，是台灣有別於其它新興民主國家的特徵。而且，台灣有幾個規模完善而技術純熟的選舉研究團隊，受到如國科會等政府部門的長久支持，累積出豐富的經驗資料，且已對外公開。正如美國有許多理性選擇的作品是以選舉爲對象，台灣的選舉經驗資料也是孕育類似研究的良好土壤。瀏覽台灣的選舉研究論文，可以發現歷來都十分強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取向，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選擇理性選擇範疇的主題，如策略性投票、分裂投票、政黨提名、配票等。隨著調查和分析技術的進步，這些領域應該有很好的發展前景。[31]憲政選擇是另一項常引起理性選擇論者關切的課題，但研究的困難度就高得多。政治菁英對於憲政制度的偏好不見得明確，更遑論一般民眾。以台灣一九九七年的憲政改造爲例，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較希望能擴充總統的權力，在野的民進黨則仍主張保留國會的閣揆同意權，結果交換出總統沒有主動解散權、國會失去閣揆同意權的半總統制（Lin, 2002）。如果當時兩黨預期三年以後朝野位置將會互換，或許就不會這樣改造台灣的憲政體制了。以當時各黨所掌握的訊息而言，其選擇是理性的。但這也表示我們需要了解具體的歷史情境才能進行解釋，而這種情境很難被一般化。

以上所述的議題，畢竟只是台灣政治的一部份而已。其它的課題，或是欠缺能檢證理性選擇的資料，或是根本不適用這個研究途徑。當然，論文作者不熟悉理性選擇的論述方式，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要了解非理性選擇的論文究竟採取何種途徑、探討什麼主題，需要另外進行詳細的研究。不過我們還是能粗略將其歸類：

---

[30] Chalmers Johnson 曾以區域專家的身份和理性選擇學派的非洲專家 Robert Bates 進行辯論，凸顯兩者的差異所在。見 Johnson (1997)。

[31]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是國會研究。在美國，這是理性選擇成果豐碩的領域之一。台灣的國會制度化程度不若美國高，資料的周全性和公開性也有待提升，但就立法活動的性質而言十分適合理性選擇來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許多論文採取敘述性的研究途徑。這個途徑重敘事（narratives），對於研究主題或採歷史描述，或透過訪談蒐集原初資料。其目的並不在建構通則，而在描繪具體的政治過程或事件歷史，所以並不算分析性的論文，更不屬於理性選擇。[32] 例如，某類論文具體描述台灣歷次的修憲過程，縱有分析的意涵，仍以歸納爲主。有些論文受到歷史結構論的影響，雖然有很強的分析性，但分析層次直接置於總體，和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不同。此外，有不少研究企圖建構比較類型學。例如，許多研究憲政體制、半總統制或修（制）憲程序的論文，嘗試將所研究的體制分類，並說明產生特定類別的原因。這種研究當然是分析性的，但其性質不在解釋政治行動的集體後果，而在概念的精細化，所以也不屬於理性選擇。

其次，某些研究以台灣的政治發展或民主化爲被解釋項，但其解釋變項並非菁英或民眾的策略選擇，而是政治文化或民主價值。[33] 在選舉研究的領域中，有相當多的研究強調選民的心理結構或價值認知如何影響其投票行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政黨、族群或國家認同和其它的社會經濟背景爲自變項，解釋選民在某次選舉中的投票抉擇。還有某些研究，集中焦點在統計或調查技術上，希望藉此更精準地呈現選民的投票樣態。這些途徑對於了解台灣的民主化和選舉競爭有很大的貢獻，但仍然留下許多可以讓理性選擇發揮功能的研究議題。例如，以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和立委選舉爲例，爲何類似的價值背景和社會條件可以讓各黨派在兩場選舉中有不同的表現？如果從理性選擇的角色來說明選舉議題和選舉制度對政黨利益以及選民投票策略的影響，就十分容易解釋了。整體而言，理性選擇對於選舉和民主化仍有不少參照作用，如選民和政黨間的「雇主代理」（principal-agent）關係、議題投票與政黨認同的關係、國家認同的理性基礎、選舉動員的社會網絡分析等。

第三，基於兩岸關係對台灣的重要性，中國大陸研究一直是台灣政治學研究中份量很重的一塊，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研究》的論文最有代表性。

---

[32] 所謂分析，是指針對特定資料背後的因果機制提出解釋。有人認爲只要鋪陳資料就有分析的意涵，但本論文仍以論文是否建構明確的分析架構來作區隔。

[33] 關於以策略選擇來解釋民主化的過程，著名的作品是 Colomer (1991)。作者從菁英集團的分裂與結盟來解釋西班牙的民主化過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瀏覽該期刊，即可了解此一領域的研究取向。其要項爲：對特定事件採取歷史分析；體系特性分析（如民主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法案或決策分析；外交或軍事政策；制度分析（如基層選舉、黨政改造、產權改革等）。其中體系分析和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有所差異，所以不屬於理性選擇。就其它議題而言，要將理性選擇的某些工具運用在中國大陸研究不是不可能，但問題在於如何以有限的資訊來建構分析模型。對許多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訊息的蒐集才是當務之急。如果訊息不足，建構再精細的理論模型也是隔靴搔癢。所以，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理性選擇關係不深，是可以理解的現象。

其它領域所佔的相對比例較低，然仍有其特色。在國際關係方面，區域研究扮演吃重的角色。除了少數應用賽局理論探討貿易談判、兩岸關係或美中台互動等議題，大多數的論文以敘事或個案分析爲主，範圍則各區都有。[34] 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或地方行政的領域，除了組織理論可能和理性選擇有關，其它大多置焦於政策產出或政策評估，而後者的基準往往是規範性的。也有相當多的論文探討政府制度或政策形成的的模式，但又和實證取向的制度論不同。這些，都和理性選擇沒有直接的關連。最後，政治學方法論和規範研究仍是不可忽視的領域。規範研究又以兩大類爲主：政治思想與法理分析。不論中西政治思想，對台灣政治學一直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有相當可觀的論文出版。[35] 法理分析介於政治學和法學之間，在數十年前曾是政治學的主流，目前則以行政法、國際法、人權、歐盟憲法以及憲政法理的著作爲多。

以上的歸類當然不能窮盡所有非理性選擇的研究取向，但已勾畫出大致的輪廓，從其特性也可略知爲何理性選擇難以對其發揮所長。如果說理性選擇有相當程度依賴美國政治和美國政治學的特性才開始受到重視，要

[34] 如果略加比較，可以發現台灣政治學者對不同地區的關心程度有所差異。相當多的學者以台海或兩岸爲出發點切入其它地區。在其它地區方面，東亞和東南亞受到的注意較多，歐洲聯盟則是後起之秀。其它有關中東、拉美或非洲的研究非常有限。

[35] 需要說明的是，本論文以期刊論文爲分析對象，會忽略以出版書籍爲主的次領域，而政治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以書籍的形式運用理性選擇的政治學相關著作(翻譯不計)，據筆者所知仍極爲稀少。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此典範擴張至其它區域自會面臨一些困難。以台灣爲例，某些議題和美國具有類似性（尤其是選舉），所以產生理性選擇的論文較多。但其它的「地方特色」則可能使此一途徑受到限制，例如資料取得不易（如立法院的投票紀錄）、政治變動大（如 14 年 7 次修憲）以及東亞政治所特有的「非正式」（informal）特性等（Dittmer *et al.* eds., 2000）。尤其是後者，常常使許多制度淪爲形式，和解釋政治行動的實際規則有很大的落差。這些特殊性和理性選擇並沒有本質上的矛盾。然而，在用理性選擇（或者任何理論）解釋「爲什麼」之前，台灣的政治學者得先耗費功夫去了解「什麼」。否則，理性選擇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

陸、結　論

透過地毯式的檢證，本論文發現理性選擇在台灣政治學研究中所佔的份量十分有限，只有一成左右。如果以是否採取最基本的計量工具爲範疇，量化研究的比例也不過三分之一。對於希望能以美國爲標竿，提升台灣政治學研究國際水準的人而言，這表示進步的空間還很大。對於強調政治學研究本土化、多元化的人而言，這個結果或許可以讓他們鬆一口氣。不論學者對於政治學方法論的態度如何，本論文所指出的現狀都值得關注。不管用理性選擇或計量的標準來看，台灣政治學現存的學術產品都是多元的。這種多元性有相當成度根植於台灣政治現象的特殊性。理性選擇如果面對的是規則不清、價值紛亂的社會，就不容易形成穩固的假定，分析力也會減損。而這些現象，正是台灣的特色。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除了少數高度建制化、成熟化的社會，大多數的區域都有類似的特徵。我們的問題應該不是「理性選擇在台灣的政治學界有多大的拓展空間」，而是「理性選擇在美國以外的政治學界有多大的拓展空間」。混亂的規則和價值，才是研究這些區域的重點課題。

不過，本論文也發現若干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理性選擇的論文雖然數量少，但和計量方法有密切的關係，且出現在 TSSCI 期刊上的比例相對較高。這顯示此一途徑具有超越其比例的影響力。隨著 TSSCI 對學者評鑑的重要性日增，這個影響力會不會也擴大？其次，雖然台灣和美國的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學在研究取向上有顯著差異，但美國的影響力仍不可忽視。如果我們把狹義和廣義理性選擇的論文作者人次當分母，計算當中有多少人是留美博士，得到的比例是 99 / 133，亦即 67.6%。[36] 和表 1 所列的學者背景相比，即可探知美國政治學教育的影響。再者，新一代的政治學者，是否更熟悉這些研究途徑？這兩個現象是否透顯台灣政治學未來的發展趨勢？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我們留心。

當然，這篇論文本身就是運用計量方法來探索理性選擇的角色，所以如果計量方法有任何可議之處，這篇論文也不例外。就客觀資料來看，將理性選擇看做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霸權，的確如同海市蜃樓般的虛幻。然而，霸權可能不僅表現在對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支配上，更可能顯現在思想上的禁錮狀態：一個不滿理性選擇的學者，隨時要面對論文審查、升等續聘或申請研究計畫的查核；在匿名的學術慣例之下，審查人可能就是對手。這種主觀認知，很難用學術產品的性質來作量的判斷。運用理性選擇的人可能不多，但若其對重要學術期刊的影響較大，對研究資源的掌控力較強，就可能醞釀出這種心理上的被宰制狀態。所謂改造運動，或許就是要透過集體行動，解放躲在研究室或教室一角暗自嘆息自己不被重視的一群學術長工。

這種情形在台灣還沒有發生，而台灣政治學者關懷對象的特質，也讓這種學術霸權不易發生。在這個情勢下，或許正該讓不同的研究途徑相互對話。這篇論文嘗試打破幾個關於理性選擇的迷思，算是這種對話的某種引子。其中最大的一個迷思，就是把理性選擇當成具有普遍意涵的經驗理論。理性選擇其實只是一套世界觀，認爲總體現象的成因在於意向性（intentional）的個體行爲。所謂理性，不過是行動者清楚而一致的好惡判斷而已。不同的行動者可以有完全相反的偏好，政治現象之所以發人深省，往往就是因爲這種歧見。其實，理性選擇固然無法脫離經驗世界而成其理論，其它的研究途徑卻可透過理性選擇而拓展其論域。例如，將理性選擇用在歷史研究上，便成爲「分析敘事」（analytical narratives）（Bates *et al.*,

[36] 此類論文中，共有九人次的作者非政治學者，已從計算中扣除。如果只算狹義的理性選擇論文，留美比例更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8）[37]；以理性選擇來詮釋 Habermas 的溝通理論，可以同時拓展兩個理論的縱深（Johnson, 1993）。更重要的是，所謂理性選擇的科學觀，反映的其實是牛頓式的機械主義，認爲世界是可以在「他者不變」（*ceteris paribus*）的前提下切割的。其它的科學觀，例如測不準原理、混沌理論、複雜系統等，或許更接近人類社會的實態（蕭全政，1998）。

總之，認爲理性選擇是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霸權，可能是虛假的印象。然而，就算有一天理性選擇真的成爲學術霸權，這種霸權仍然可能是虛假的。因爲，如果沒有對於個人偏好的深入描述、不能對行動意義進行人類學式地體悟，或無法像歷史學家般掌握人在進行抉擇時的進退維谷，理性選擇所提供的解釋就會是貧弱的，甚至是虛假的。正因理性選擇無法單獨成爲經驗理論，才愈發凸顯其需要和其它研究途徑合作。也只有這樣，理性選擇才能發揮深遠的影響。

[37] 這當然是艱難的工作。*Analytic Narratives* 一書也有許多的缺陷，見 Elster (2000) 的批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表 1 政治學者任職機構一覽表

學校或機構名	系　　所　　名	學校或機構名	系　　所　　名
中山大學	大陸研究所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中山大學	中山學術研究所	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文化大學	中山學術研究所
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文化大學	大陸研究所
中央警察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文化大學	美國研究所
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玄奘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政治學系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	東海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南華大學	亞太研究所
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南華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南華大學	歐洲研究所
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	南華大學	國際關係暨大陸事務學系
空中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淡江大學	歐洲研究所
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	美國研究所
政治大學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淡江大學	拉丁美洲研究所
政治大學	東亞所	淡江大學	大陸研究所
政治大學	俄羅斯所	淡江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
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研究所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銘傳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		
暨南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暨南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		

說明：不包含技術學院以及沒有政治學相關系所的機構。某些機構（如中山所、國發所、大陸所等）的人員包含許多學科，則只計算其中的政治學者。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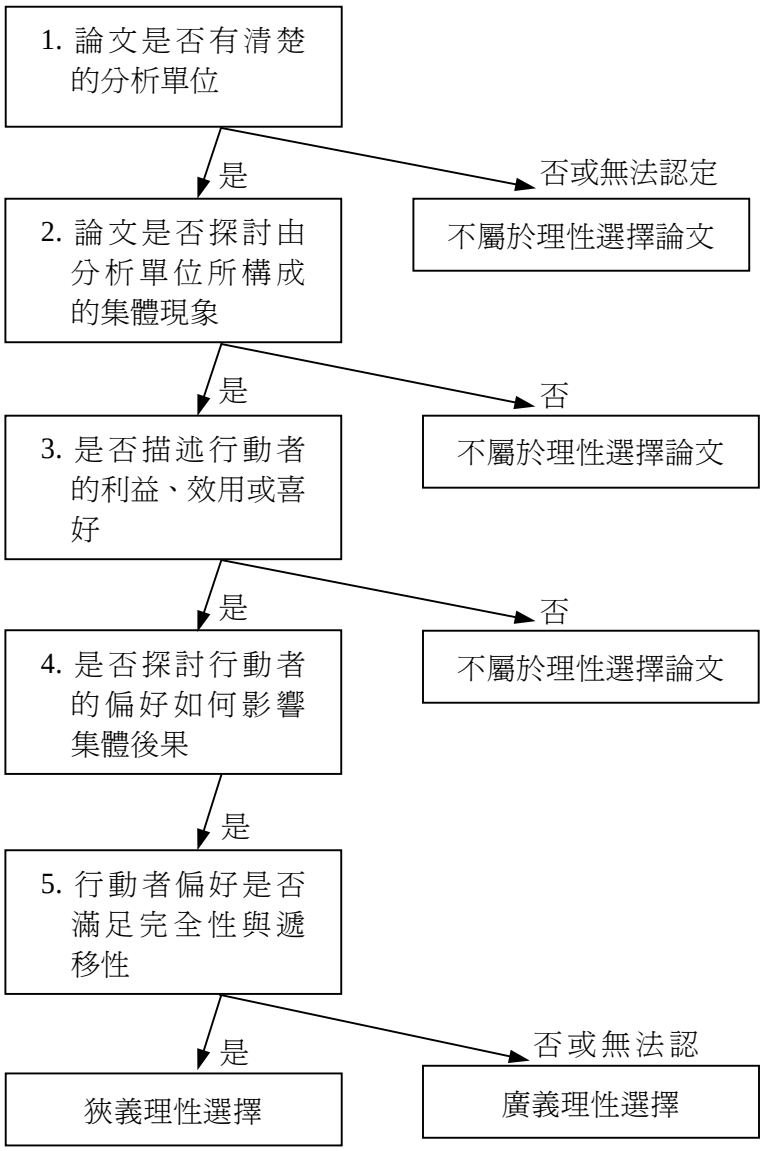
附錄二：檢閱期刊及相關資料

期刊名稱	時間	期卷	本數	篇數	台灣	比政	國關	中國	方法	公行	思想	Q	R	Q%	R%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98~04	6.1~12.1	29	32	10	19	2	2	4	7	4	9	7	28.1	21.9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98~04	10.1~16.4	13	60	26	32	5	10	3	10	2	23	0	38.3	0.0
中國大陸研究	98~04	41.1~47.3	63	149	20	35	43	141	3	7	1	51	6	34.2	3.4
中國行政	98~04	63~75	12	47	17	1	1	1	4	45	0	13	2	27.7	0.0
中國行政評論	98~04	7.1~13.4	25	135	54	17	0	4	2	123	0	49	10	36.3	5.2
公共行政學報	97~04	1~13	13	90	43	4	0	1	1	76	0	25	4	27.8	4.4
台灣政治學刊	98~04	3~8.2	8	33	22	26	5	1	3	1	0	24	11	72.7	30.3
行政暨政策學報	98~04	29~39	11	59	26	12	1	0	3	50	1	17	5	28.8	3.4
東吳政治學報	98~04	9~19	11	57	24	25	4	5	3	8	14	26	13	45.6	17.5
空大行政學報	98~04	8~14	7	66	26	11	4	0	0	60	1	27	4	40.9	6.1
政治科學論叢	98~04	9~22	14	127	38	44	27	7	8	26	31	26	7	20.5	5.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02~04	1~11	11	31	3	10	0	1	3	0	22	2	2	6.5	3.2
政治學報	98~04	30~37	8	60	22	32	12	4	7	5	1	12	6	20.0	8.3
問題與研究	98~04	37.1~43.6	60	313	48	147	147	24	15	8	3	97	21	31.0	6.4
國家發展研究	01~03	1.1~3.1	5	16	6	11	1	4	0	3	0	7	2	43.8	12.5
理論與政策	98~04	12.1~17.4	24	113	85	52	7	14	2	36	1	56	18	49.6	10.6
遠景季刊	00~04	1.1~5.4	20	84	31	12	48	26	1	0	0	18	6	21.4	7.1
歐美研究	98~04	28.1~33.2	28	22	2	14	6	0	0	2	0	12	4	54.5	18.2
選舉研究	98~04	5.1~11.2	14	80	72	80	0	0	0	0	0	74	30	92.5	37.5

說明：⑴依期刊名稱排列，⑵同一論文可能跨越不同次領域，⑶ Q 表示使用計量工具，⑷ R 表示狹義與廣義類之理性選擇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對論文是否歸屬「理性選擇」的篩選流程



說明：無經驗指涉的論文已歸於非理性選擇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操作實例：

論文名稱	姚惠忠，1998，〈政黨提名策略與派系輪政之競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3)	盛杏湲，2000，〈政黨或選區？立法委員的代表取向與行爲〉，《選舉研究》，7(2)	徐斯儉，2004，〈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議〉，《中國大陸研究》，47(1)
分析單位	清楚：地方派系、政黨	清楚：立法委員	清楚：中國大陸決策者
是否探討由分析單位構成的集體現象	是：提名結果（即提名之派系數）	是：立法院整體表現	否：只探討決策者對不同政治改革方案的評估
是否描述行動者的偏好或效用	是：以基數（cardinal）效用界定派系利益	是：影響立法委員選票之因素	是：比較穩定和民主化對決策者的意涵
是否探討偏好如何影響集體選擇	是：以 Bayesian 賽局處理策略互動	是：以個別行爲加總	否
行動者偏好是否滿足完全性與遞移性	是：因爲採取基數效用	不易判定：未對政黨或選區進行偏好排序	難以判定
歸類	狹義理性選擇	廣義理性選擇	非理性選擇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石之瑜，2003，〈政治科學中形式理論的運用與瓶頸--從賽局理論談起〉，《東吳政治學報》，17: 1-19。

吳玉山，林繼文，蕭高彥，蘇彩足，2003，《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徐振國，2002，〈政治學方法論偏頗發展的檢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 123-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盛治仁，2003，〈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學運用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17: 21-51。

蕭全政，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出版社。

蕭全政，1998，〈讓政治科學回到政治的科學〉，《暨大學報》，2(1): 103-132。

謝復生，2000，〈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見何思因，吳玉山（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頁 141-153。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二、英文部分

Anand, Paul. 1993.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Ris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en-Smith, David and Jeffery S. Banks. 1999.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 Collective Preferenc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Axelrod, Robert M.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Bates, Robert H., Avner Grief, Margaret Levi, J. Rosenthal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8. *Analytical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lvert, Randall L. 1995.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ed. Jeffrey S. Banks and Eric A. Hanushe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15.

Colomer, Josep M. 1991. "Transitions by Agreement: Modeling the Spanish W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1283-1302.

Cox, Gary W. 1999.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Reply to Green and Shapiro."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2): 147-169.

Dawkins, Richard. 1990.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ttmer, Lowell,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 S. Lee eds. 2000.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 Jay and Michael Munger. 1990. “Public Choice in Political Science: We Don't Teach It, but We Publish It.”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3(4): 604-609.

Dryzek, John S. 2002. “A Pox on Perestroika, a Hex on Hegemony: 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9–September 1, Boston.

Elster, Jon. 1993.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on. 2000.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3): 685-695.

Friedman, Jeffrey ed. 1996.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Milton.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75. *Prison Notebooks, Volume 1*, ed. by Joseph A. Buttigie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een, Donald P.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ofman, Bernard. 2004. “Reflections on Public Choice.” *Public Choice* 118: 31-51.

Johnson, Chalmers. 1997. “Reconception vs. Observation, or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0(2): 170-74.

Johnson, James. 1993. “Is Talk Really Cheap?: Prompting Conversation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Ration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cience Review 87(1): 74-85.

Johnson, James. 1996. “How Not to Criticiz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athologies of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6(1): 77-9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Econometrica* 47: 263-291.

Lin, Jih-wen. 2002.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Lee Teng-hui Era.” *American Asian Review* 20(2): 123-155.

Little, Daniel. 1991. “Rational-Choice Models and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 35-52.

MacDonald, Paul K. 2003. “Useful Fiction or Miracle Maker: the Competing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4): 551-565.

Miller, Arthur H., Charles Tien, and Andrew A. Peebler. 199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Hall of Fame: Assess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n Evolving Disciplin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9(1): 73-83.

Miller, D.W. 2001. “Storming the Palace in Political Science: Scholars Join Revolt Against Dominion of Mathematical Approaches to the Disciplin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chronicle.com/free/v48/i04/04a01601.htm (September 21).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pp, Karl-Dieter. 1999.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2): 171-202.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iam H. 1990. “Political Choi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ed.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3-181.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68.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 25-42.

Schwartz, Thomas. 1986.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ebert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99-118.

Tsebelis, George. 1990. *Nested Games: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eblen, Thorstein. 2003. “The Evolution of 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In *Evolutionary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 ed. William M. Dugger.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7-21.

Weingast, Barry R. 1996.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Robert E. Goddin and Hans Dieter Klingeman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7-1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gemony in Mirage: Rational Choice in Taiwan's Political Studies

*Jih-wen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pict the role played by rational choice in Taiwan's political studies. It reviews the debate about rational choice and specifies the definition of this approach, and then examines more than 1500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by Taiwan's leading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The percentage of articles minimally related to rational choice is roughly 10%, many of which ar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rather than applicatory. Some rational choice articles utilized statistics to confirm their hypotheses, but case studies are also prevalen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are actually irrelevant to rational cho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aiwanese political studies is thus immense. The underlying cause may b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concerns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the two places, which forces the latter to focus on "finding" rather than "explaining" facts. Accordingly, to become an empirical theory, rational choice must seek cooperation from other approaches. Whether this outcome is acceptable is a normative issue, but pros and cons of this approach should both be based 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rational choice, quantitative political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methodology,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versity and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